

WENSHI ZHISHI

文史知识

工作与治学

宋代的传奇小说

清代的科场案

古代毒蛊术

武侠小说原型流变的伦理基因

李白词真伪问题研究综述

倪其心

程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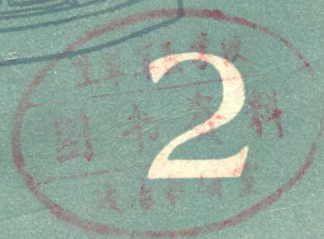
纪耕新

詹鄞鑫

拓跋逢

章尚正

1990





医药学院610 2 01478555

文史知识

1990年第2期

(总第104期)

· 治学之道 · 工作和治学

倪其心 3

文学史 { 宋代的传奇小说

程毅中 10

百 题 { 宋诗漫谈(下)

吴小如 16

· 历史百题 · 清代的科场案

纪耕新 19

诗 { 绚 烂

王明居 26

文 { 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读袁宏道《虎丘记》

徐 甸 28

欣 { 只求同道——读张岱小品文《闵老子茶》

徐城北 34

赏 { 体兼说、序 文含情、理——读袁枚《黄生借书说》

王英志 36

· 古代科技漫话(34) ·

中西古代宇宙理论的对比

江晓原 40

文化 { 古代毒蛊术

詹鄞鑫 44

史 { 谈谈先秦的聘礼

张 庆 50

知识 { 唐代的博学宏词科

刘海峰 54

· 武侠小说漫话 ·

武侠小说原型流变的伦理基因

拓跋逢 58

· 古法丛谈 · 经义决狱

梁治平 65

人物 { “英略过人”的一代枭雄桓温

李景琦 67

春秋 { “滑稽多智，沉浮取容”——冯道做官与作诗

郭兴文 72

· 文学人物画廊 ·

千载芳名留古迹 六朝韵事著西泠

——苏小小事迹的演变

马晓光 76

• 古典文学流派 • “江西诗派”杂谈	张 展	80
• 语言知识 • 岁名载、兹的来由与古代物候纪年法	王 晖	84
水·袂褰·生死 谈谈郑板桥的题画诗文	张伯伟 许图南	88 92
• 中国名著在国外 • 从东方来的巨著——《红楼梦》在英国的流传与研究	胡文彬	95
青年 } 金色猪与河伯——也谈猪八戒形象的原型 园地 } 浅析唐太宗纳谏及影响	姚立江 李 波	102 106
• 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 • 清代画家沈铨的日本之行	张希广	109
• 文史古迹 • 百丈金身开翠壁 巍巍佛阁与山齐 ——乐山大佛建造始末	千树德	112
• 文史研究动态 • 李白词真伪问题研究综述	章尚正	116
• 读者·作者·编者 • 南方藏冰亦有悠久历史 《江南才子解缙》订误	孙无痕 杨济堃	124 125
• 读书札记 • 古代媒人的称谓	徐向东	126
• 补白10则 • 拾草绳(9) 毛无所恃(35) 马肝大毒(39) 不忍当杀生之名(49) 羊质虎皮(64) 金玉 其外(71) 三虱相讼(75) 鸿常一(115) 若无此帽就热死(123) 见金不见人(127)		
郑板桥丛竹图(封二)	四川乐山大佛(封三)	

封面设计 吴寿松

工作和治学

倪其心，上海市人。1934年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副教授、古典文献教研室主任。参加过《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等教材的编写工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古典文学部分的编审工作；主要撰著有《校勘学大纲》、《中国古典文学自学指南》及论文《关于〈文选〉和文选学》、《关于卢思道和隋代诗歌》、《关于唐诗的分期问题》等。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学校担任资料员、教员。论专门的学术成就，我无所足道。如果说曾经治学，那就是我在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在师长的教诲指导下，接触了有关的学术课题，略有摸索，稍有体会。大概地说，在工作中钻研涉及的学术课题，无论巨细，都需要踏实态度、认真精神，深入思考，经受考验。

假如本职工作就是自己志趣向往的学术课题，当然理想而幸运，但这样的机遇并不甚多。一般地说，对于初涉学术、志趣未定的青年来说，在工作的具体任务中积累知识，发现课题，培养志趣，确定方向，则更为实际。大学毕业后，我最初接受的具体工作是协助老师编写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任务是搜集图书资料，注释古诗初稿。当时我年轻，以为钻研专题，撰写论文，方属学术，这类资料和注释只是具体工作。然而着手工作后，却体会到这项具体工作是从事学术钻研的基础和起点。搜集是占有资料的第一步，注释则是切实吸取前人成果的必经步骤，读懂前人著述，然后才有可能发现、探索课题。当年，吴小如老师注释汉

赋作品，开列一张涉及汉赋注释的《史记》、《汉书》、《文选》的注疏札记著作目录，指导我翻阅搜集有关资料。这项工作使我很受教益。在借阅这些图书过程中，我具体接触了史、汉、选学的著述目录；在翻阅搜集有关汉赋材料时，我初步了解了前人关于论述、注疏汉赋的大概情况和存在争议。这不仅充实了我的汉赋知识，而且培养了我的志趣，并体会到占有资料的重要和必要，从而对发现、探索课题的途径方法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不久，当我着手注释古诗时，便从目录入手，搜集查阅汉诗研究及选学撰著，努力占有资料，尽量吸收前人和师辈成果，较好完成了注释初稿，同时也积累了汉诗和选学的目录知识，了解了其学术概况，为日后涉足其中课题研究获得有益的基础和起点。几番此类工作任务后，回头一想，工作任务往往不由个人治学志趣抉择，难免抵牾，与其心态失衡而耗费时光，不如踏实工作，在任务中培养志趣，积累知识，充实自己，打下扎实基础，为深入专门课题创造条件，这同样可以治学，不失为其中一途。我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工作有范围，任务有要求。在工作任务中研究涉及的课题，不免杂碎，较难专一，日久会滋生烦恼，往往不能坚持，因而更需要认真精神。具体地说，工作中所涉学术有两类，一是遇见疑难，二是发现课题。疑难是完成任务中常有的，具体而且细小，往往不成课题，却耗费精力，但必须认真对待，问个明白，查个究竟。我曾长期从事注释教材工作，涉及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两个学科，遇见不少具体疑难，有时为了求得比较确切的解释，花费许多时间查找一个恰切的典故，或者始终不得其解，也产生过厌烦情绪。但是，不畏疑难，不嫌烦琐，寻根究底，认真求解，涓涓成流，沟通江河，使我受益匪浅。唐代诗人储光羲《田家杂兴》之六曰：“商山有高士，梁国有遗老。”旧注或以为上句指商山四皓，据《水经注》“四皓隐于商山”，下句指汉代赋家枚乘，因枚乘曾为梁孝王“梁园宾客”，梁孝王卒，枚乘归隐淮阴。马茂元先生

《唐诗选》指出其说牵强，甚是。但究竟用何典，便须查找。既然上句指四皓，则下句用典当与四皓有关，便从《汉书》关于四皓记述注疏查找，在《张良传》王先谦补注中查得一条记载：“汉有应曜，隐于淮阳山中，与四皓俱征，曜独不至，时人语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广韵》十六蒸）应曜与四皓同为秦末遗老，汉初隐士，用来比兴“相邻”、“同道”的隐士，显然较为贴切。此事又见《白帖》，可知为唐人习用常典。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应曜是淮阳老，并非梁国老。西汉淮阳国与梁国相近，梁国治所在淮阳。诗用应曜事，大致不误。但改“淮阳”为“梁国”，究竟是诗人混用误记，还是因声病而故意混用，则无从确考了。诸如此类，就事论事，收获细小，但积少成多，却使我比较广泛地接触了文史文献，逐渐学得查阅文献、索解疑难的方法途径，积累了古代作品、古典文献方面的知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有助于课题的发现和钻研。

具体疑难不等于学术课题。学术意义的估评是衡量课题的依据。发现课题需要对这一课题所属学科的学术研究有相当的了解。在成长过程中，师长的指导是不可或缺的；但自觉认真地培养自己发现、鉴别课题的能力则更为重要。从这角度看，工作任务接触知识面较广，积累资料幅度较宽，虽然不如钻研课题深入，但只要认真、踏实，却是学习发现课题的有利条件。林庚老师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时，我曾在他指导下搜集附录评论资料。这是一项资料工作，但我得到两个长久受益的收获。一是比较广泛查阅、接触了有关这一阶段主要作家作品原始资料和历代比较重要的评论著述；二是从老师对所搜集资料的取舍审定中，领会、学习了衡鉴前人评论的学术价值的观点、方法和依据，从而受到发现、鉴别课题的启发教育。我搜集的评论资料是芜杂的，经老师筛选审定，留取的是最有代表性、具有历史价值的历代有关评论，数量由多变少，质量去芜存精。从广泛搜集到全面占有，并非靠死记硬背，而是掌握其重点要点。这需要全面

的学识和明确的见解。观点从材料中来，没有材料依据的观点是无根的；材料因观点而见，没有观点指导的材料是无用的。力求以正确的观点掌握重要的材料，是达到全面占有资料的有效途径，也是发现课题的正确方法。这样的认识使我在工作中逐渐学会发现、积累课题，减少盲目和偏见。有时从材料中发现有意义课题，有时因观点而发现可探讨课题，无论资料辨析、史实考证、理论探讨、方法研究等等，都有不可取代、互相补充的价值。在搜集核查隋代作家卢思道传记资料中，我发现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明确记载：“隋开皇六年，春秋五十有二，终于长安。”与通行文学史据《隋书》、《北史》本传推算卒年有出入。这便是一个应予辨析考证的课题。在查考过程中，我又发现卢思道一生主要活动于北周，隋初已去世，作为隋代主要代表作家来论述，似为未妥，值得探讨。这又是一个史论课题，涉及南北文风比较和交流。与此相关，我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课题，如隋文帝改革文风与隋炀帝爱好宫体对于隋代文学发展的作用；薛道衡应是隋代文学主要代表作家；虞世南在隋、唐之际的地位作用等等，这些前人已多评论的课题，都还存在一些史实、评论上可以再予探讨的问题。综合起来，也许会对整个隋代文学的论述有所推进。

材料和观点的辩证关系中，一般情况下，正确的观点是重要的，往往属于主导。在完成具体工作中，往往由于任务既定明确，因而容易有意无意地满足于既定观点的指导，流于被动，不多思索。实际上，正因为工作任务是具体的，更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须深入思索。这样可以更好完成任务，同时也更能发现、积累、钻研所涉的学术课题，培养、锻炼、提高自己治学的基础和知能。我曾讲授北宋文学和宋代诗歌。起初因为满足于完成教学任务，主要是概括通行的史论评述进行讲授。在讲授过程中，我查核了部分原始记载和作家作品，发现通行史论宋初文学发展存在一个“时间差”，认为宋初数十年中，西昆体形式主义诗

赋流行，占有统治地位，所以接着发生了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或称北宋古文运动。然而事实是西昆体主要代表作家杨亿出生在宋太祖开宝七年，到宋太宗朝不过从童年步入青年，而《西昆酬唱集》的诗歌唱和发生在宋真宗景德年中，编纂刊行于大中祥符后，距宋太祖立国的建隆元年近半个世纪。也就是说，西昆体的流行至早在宋初三十年后，恰恰不在宋初三十年间，这是明显的“时间差”。指出这一事实出入并不困难，值得思考的是这三十年的文学不会空白，究竟怎样？为什么发展到西昆体？又为什么学者会出现这样明显的误差？后来我又发现，前两个问题在前人著述中不乏如实评述，但往往不受重视，或不予正视，似属故意忽略含糊。因而使我体会到，对于治学来说，后一个问题更有意义，应当忠于史实，用正确的观点深入思索，不宜拘于某种既定观点来简单套用。实际上，任何学术成果都是一定观点和相应材料结合的产品。考据可以验证史实，探究原因则主要依靠观点和方法。随着知能学识的增长，观点方法的主导作用日益显示出来，更加需要深入思考。

在工作任务中钻研的课题，一般是层次不高的具体课题。在本职工作业务比较熟练后，会有较多时间精力来治学，在具体课题接触、积累较多后，会进一步对较高层次的课题有兴趣，试图探讨。步入这一阶段之际，治学的自主幅度大了，但新的矛盾产生了。例如任务和志趣在高层次上再度碰撞，需要安排；高层次课题要求更加深广的学识知能，需要提高；有兴趣的课题不止一个，需要选择，等等之类，处置不当，便有苦恼。归结起来，主要一个苦恼是感到身不由己。这是一种考验。首先，治学如为人，应实事求是认识自己，要从苦恼中总结自己，有自知之明，须量力而行，知不能而知能，有不为而有为，做努力可及的事情。如果从已有知能基础出发选择有兴趣的课题，从工作任务中不断扩充提高自己，改善主观条件，则会变不利为有利，水涨船高，轻舟前进，自主自由，无可烦恼。在发现高层次课题后，有志深入

探讨之前，不妨自己作一番可行性鉴定，不要“跟着感觉走”，不要凭空构想空中楼阁。其次，文史学科是社会科学，高层次课题是一定范围和条件下的规律性研究。恩格斯说过：“在理论上推进一步，没有几年冷静的研究功夫是不行的。”从根本上说，文史学科规律性研究，必须经受历史社会实践的严峻考验，主观功到未必就成，功夫不到是肯定不成的。在探索未知领域的道路上，无所驾轻就熟，无缘哄动效应，有风险，没有承受考验的志气胆识是不行的。而正因有志气，有胆识，所以自觉自在，充满治学乐趣。有志治学，并且决心坚持下去，要准备接受考验。对于在工作中治学者亦然，或者更为需要。

治学其实各有其道。我是个教员，教过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籍整理等不同专业课程。对工作还算守职，论学术都不专深，贬称“万金油”，过誉谓“杂家”，当之不妨，亦自有道。其特点便是“杂”，但不是杂七杂八，而是杂中求一，寻找求解之道。从疑难到课题，从具体到理论，从低层次到高层次，虽因工作变动，任务不同，涉及多而探索浅，但我都希望解决问题，切合实际。当今时代，新思维、新观点、新方法纷至沓来，应接无暇，相信各有道理，但正确与否，则都需经受实践的检验。曾经有过一种时髦观念，似乎有了某种新方法，便有新发现，取得新成就。其实不然。有问题，才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以是否得到正确答案为检验方法的衡准。用新方法试解老问题，当然应当倡导，但并不等于肯定新方法一定正确，更不是新方法发现了老问题。发现问题还是老老实实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不切合实际，再新的方法也是无效的。理论上说，正确的一般方法论能够指导认识，改造世界，但解决具体问题还得用具体方法。钻研各类课题，都不是用某种万验的方法可以一套便得的，而需要综合运用各种具体方法，解决不同层面的具体问题。我从不同工作任务中学得了一些具体方法，体会到一个不深奥的道理：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具体方法。宏观指导的方法

论是必要而重要的，但应以正确为准，而不以新旧论，更非万能钥匙。具体的方法技能是必须学会的，因为锁是一把一把开的。文史学科的迷宫里千门万户，如果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每扇幽闭的门锁，当然很好，但是实际上大概不行。治学是有方法的，但万验的灵方是没有的。学者专家提供许多治学方法的见解，都是宝贵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并不都适合于志趣不同的后学者的具体课题。我体会到，更重要的是学习师辈学者的精神，自己总结经验，自行探索切实有效的方法，不断深入寻找求解之道。至于是否取得成就，可否作出贡献，我觉得有两句老话值得铭记：一句是“有志者，事竟成”，关键在有志；另一句是“失败乃成功之母”，这较之“天才加勤奋”的成功格言，更为实际，因为并非人人都是天才。

拾 草 绳

有盗牛而被枷者，熟识过而问之曰：“汝何事？”答云：“晦气撞出来的。前在街上行走，见地上草绳一条，以为有用，拾得之耳。”问者曰：“然则罪何至此？”即复对云：“绳头还有一小小牛儿。”

——《雅俗同观·精选雅笑》

〔译文〕有个因偷牛而被戴上枷锁的人，他的一位熟人见到便问：“你犯了什么罪？”他回答：“我撞上了坏运气。前几天在街上闲逛，看见地上有条草绳，觉得有用处，便捡了回来。”那人说：“这样的事怎么能判这么重的罪呢？”他吞吞吐吐地说：“绳子上还拴有一头小小的牛。”

宋代的传奇小说

• 文学史百题 •

程毅中

传奇体小说是唐代的一绝，到了宋代还有不少人写。鲁迅编的《唐宋传奇集》里就选录了一部分代表作。一般说，宋代传奇成就就不高，比起唐代来不免逊色。但是也不能一概否定，不能割断文言小说发展的历史源流。没有宋代传奇，就不会有元明的传奇小说，也就不能解释清代《聊斋志异》的出现。

宋代的文言小说，一般流于质实平直。明人胡应麟曾说：“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少室山房笔丛》卷29）这个论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总的看，宋代言言小说多数是比较简短的志怪体作品。最著名的是洪迈的《夷坚志》，原书四百二十卷，以多取胜。大部分篇章还是实录见闻，很少艺术加工，如鲁迅所说的：“偏重事状，少所铺叙。”（《中国小说史略》第11篇）不过书中有一些篇幅曼长、情节曲折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传奇小说。如甲志卷17《解三娘》，讲一个女鬼诉冤的故事，篇末说明关耆孙“尝为作记”，原来曾有一篇单行的传记。甲志卷19《毛烈阴狱》讲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二刻拍案惊奇》卷16《迟取券毛烈赖原钱》也就是根据这一故事改编的，洪迈在篇末注明刘夷叔为作传。乙志卷4《张文规》讲一个入冥对案的故事，情节很复杂，篇末也注明吴可尝作传，可见原来曾是一篇单行的传记。《夷坚志补》卷2《义倡传》，讲的是长沙义倡爱慕秦观的故事，文中说明来源是钟明所作的《义倡传》。不过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虚构的，后来洪迈在《容斋四笔》卷9《辨秦少游义倡》里又作了更正的说明。这正足以证实《夷坚志》里收录了一部分宋代的传奇体小说，只是曾经洪迈作了一些修改。最明

显的例证是三志己卷1《吴女盈盈》一篇，讲王山所爱妓女盈盈死后成仙的故事，注明：“山有《笔奁录》详记所遇。”王山的《笔奁录》是一本已经失传的小说集，幸好这一篇《盈盈传》还保存在李献民所编的《云斋广录》里，可以拿来和《夷坚志》作对比。洪迈删繁就简，改变了叙事角度，减少了细节描写，也就大大损伤了原作的文采。于此也可以看出，洪迈的文章追求古朴简洁，不喜欢辞藻绘饰，还是代表了宋代小说家崇尚质实的风气。

传奇和志怪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从题材上看，传奇也有不少神仙鬼怪的故事，有人认为这类作品还是志怪小说。鲁迅说《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中国小说史略》第22篇）。他的意见，可以理解为传奇和志怪的区别在于写作方法有所不同。唐代传奇的成就，就是“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同上第8篇）。因此，如果撇开题材的宽窄不谈，传奇和志怪的差别，大体上可以从这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传奇的篇幅较长。六朝的志怪小说一般只是记述异闻，粗陈梗概，因而都是短篇作品。传奇体小说则大大加强了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记事则曲尽颠末，记言则摹拟声情，篇幅自然就扩展了。在古代小说里，可以说是中篇作品。当然，篇幅长的不一定是好作品，有些甚至连小说也算不上，那是另一个问题。

第二，传奇注重文采。作者有意识地讲究语言的艺术，把小说当作文学作品来写了。唐以前的小说只是史官的余事，把志怪当作五行志之类的著作。如干宝编纂《搜神记》的目的是“明神道之不诬”。因此史学家总是把志怪小说列在史部的杂传一类。唐代文人写传奇重视“诗笔”，爱用词章，较多地接受辞赋的传统，往往运用骈俪句。北宋古文家尹洙指出，“用对语说时景”是传奇体的一大特征。这一点不仅针对裴铏《传奇》而言，也适用于许多传奇体小说。

第三，传奇注重意想。作者比较自觉地加强艺术的虚构，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志怪小说所讲的神怪故事，实际上也都是虚构的，然而多半是不自觉的，作者自己并不意识到是在创作。传奇的

作者则有意识地创作小说。正如纪昀指责《聊斋志异》时所说：“今燕昵之词，嫖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这种出于作者代言的细节描写，就是凭借想象的文艺性创作。

此外，有许多传记体的作品，写的是人世的现实生活，甚至是当时实有人物的传闻轶事，到底算传记文学还是传奇小说，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只能主要从艺术价值上给予评定。

宋代的文言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摹拟史传的纪实派和注重词章的言情派。前一派占有优势，因为当时的小说家想以“可信”见长，标榜言之有稽。宋初就出现了一些学者型的作家，如史官乐史就是。他所写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都是故事新编，堆砌了不少史料。《绿珠传》主要是根据《晋书·石崇传》编写的，传中引述到王昭君、六出、竊娘等好几个女性的事迹，还引用到了《周秦行纪》里完全出于虚构的绿珠鬼魂赋诗言志和拒绝伴寝的情节，实在是体例混乱，不伦不类。《杨太真外传》也是汇编了许多杨贵妃的故事，包括《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松窗录》、《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中的事迹，兼收并蓄。它容纳了不少唐人小说里的材料，当然就不能说是真正的史传，但作为传奇小说也是不大够格的作品。

以单篇行世的宋代传奇，多数收录在刘斧编的《青琐高议》里，如张实的《流红记》，丘浚的《孙氏记》，秦醇的《赵飞燕别传》、《谭意歌记》，柳师尹的《王幼玉记》，钱易的《越娘记》和佚名的《张浩》等。这些传奇小说不是一人一时所作，风格不完全一致，但都是北宋前期的作品，比较明显的倾向是写现实生活中爱情婚姻题材的增多了。即使写神仙鬼怪的，往往写的也是爱情故事，因此我称之为言情派。很多作品完全不涉及神怪，如孙氏、谭意歌、王幼玉、李莺莺等，都是很有个性的女性，表达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再现了当时的某些生活风貌。尽管不少作品有摹拟唐人作品的痕迹，但又有不同于唐人的特色。如《张浩》就是《莺莺传》的翻

案文章，李莺莺和崔莺莺就有不同的性格和行为。王幼玉又与霍小玉有相似的命运，连名字都是相似的，可是结局不同，因为性格不同，柳富和李益也不一样。

宋人传奇的另一特点是在因袭中又有所改造，更显示了作者有意识的虚构。如《流红记》是根据《云溪友议》所载卢渥题红叶故事改写的，作者又增加了一些情节，添出了几首诗，故事更完整了，同时也更证明其为小说而不是实录。《王榭》一篇载于《青琐高议》别集，又见于刘斧的《摭遗》，宋人引作《乌衣传》，据说是托名钱易所撰。这篇传奇借用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竟敷演成一个王榭入乌衣国与燕子通婚的故事，这是一种大胆的虚构。正和《丽情集》所载《燕子楼》故事一样，把白居易的《感张仆射诸妓》诗说成是讽谕盼盼自杀以殉张建封而作，那就是说话人敷演捏合的手法。还有一篇沈辽的《任社娘传》，收在《云巢编》里，采用《南唐近事》、《玉壶清话》等书中所记韩熙载为歌妓秦弱兰诱惑的传说进行了再创作，改写为任社娘的故事，构思很巧，增添了许多细节，充实了任社娘的性格特征，是一篇传奇性很强的小说。沈辽的文集里居然也收入了这篇作品，可以说是大胆的创举。佚名的《李师师外传》虽然依傍一定的史实，但很多情节是与历史记载不符的。由于作者有许多精致的细节刻画，就把李师师的个性写得比较鲜明丰满了。

《青琐高议》所选录的传奇，相当一部分作品都穿插有诗歌。注重“诗笔”，这是传奇体小说的特征之一。如《流红记》、《温泉记》、《王幼玉记》、《谭意歌记》、《张浩》等就是如此。这些诗比较浅俗，远不如唐人作品那么优雅，但在宋人传奇中还算是讲究词章之美的。最注重诗笔的一个选本是《云斋广录》。这部书后六卷所收的传奇小说，故事都很新颖离奇，文辞比较华丽，插入的诗歌很多。如上面提到的《盈盈传》，就以王山和盈盈两人互相赠答诗词为主要情节，还把王山所作的一首长诗《寄盈盈歌》全篇单独附在后面。又如《王魁歌》（并引）把《王魁传》的故事用叙事诗的

体裁复述一遍，前面有一段小引作了简括说明，然后说：“贤良夏噩尝传其事，余故作歌以伤悼之云尔。”以《王魁歌》与《王魁传》相配合，就像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李娃行》与白行简的《李娃传》相配合一样。《云斋广录》所收传奇，穿插的诗歌一般都是富于情采的。比较著名的是《钱塘异梦》中所记苏小小和司马槱合作的《蝶恋花》词，这首词曾被称为十大曲之一（见《辍耕录》卷27）。这个故事非常著名，据以改编的话本有《钱塘梦》（附载于几种明刻本的《西厢记》），杂剧有白朴的《苏小小月夜钱塘梦》（见《录鬼簿》，已佚）。又如《西蜀异遇》一篇，写的是人狐相爱的故事，情节十分离奇曲折。李达道在花园里遇见了一个美貌少女，自称宋媛，两人相爱之后，遭到了许多磨难。李生的父母当然是主要的障碍，而且还有旁人从中破坏。有个李二秀才揭穿了宋媛是狐妖，又给李达道一道符，宋媛就不能再接近他了。后来李达道收到了宋媛的一首《蝶恋花》词，大为感动。他说：“然则吾生之前、死之后，安知其不为异类乎，媛不可舍也。”他明知宋媛是异类，还是不顾一切地爱她，毅然毁弃了符，再和宋媛结合。宋媛的词的确写得哀婉动人，原词如下：“云破蟾光穿晓户，欹枕凄凉，多少伤心处。唯有相思情最苦，檀郎咫尺千山阻。莫学飞花兼落絮，摇荡春风，迢迢抛人去。结尽寸肠千万缕，如今认得先辜负。”其后宋媛还写了好几首富有情采的诗词。这个狐妖的性情写得很真挚，形象鲜明，已经接近《聊斋志异》的水平了。

这一部分宋人传奇常用诗歌来串连情节，刻画人物，又借以增添小说的文采。这既是继承唐人传奇中注重诗笔的传统，又是受了通俗小说和说唱文学的影响。唐宋以来有一种诗话体的话本，常用小说人物所作的诗歌作为点缀或过渡，如敦煌写卷中的《苏武李陵执别词》和宋人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及《张子房慕道记》、《快嘴李翠莲记》等。这种体制对于明代传奇又有很大影响，如《剪灯新话》等一系列作品都以大量诗词作为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在增加叙事文学的文采和抒发人物的性情等方面不无好

处，但越来越流于冗滥，诗多而质量低劣，那就走向反面了。

《云斋广录》是宋代传奇的一个有鲜明特色的选本。书中所收作品大多想象奇特，构思新颖，文字华丽，穿插的诗词艺术水平较高，虽多而不滥，可以达到沈既济在《任氏传》中所提出的“著文章之美，传要眇之情”的要求。它代表着注重词章的言情派，与崇尚质实的纪实派迥然不同。这一派作家比较自觉地讲究技巧，驰骋想象，在小说的艺术构思上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可能对清代《聊斋志异》系列的小说有导夫先路的作用。以前的评论者指责它“鄙陋无所稽考”（《郡斋读书志》）、“文既冗沓，语尤猥褻”（《四库全书总目》），那是以传统的小说观来要求，而无视于中国小说发展趋势的苛论。明末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说：“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宋人通俗，并不限于话本小说，即使传奇体小说也是如此。言情派的传奇一方面承袭唐代传奇而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又靠近通俗小说的道路。李献民把传奇小说分成“灵怪新说”、“丽情新说”、“奇异新说”、“神仙新说”等门类，显然是模仿通俗小说的作法。除了上举的《钱塘异梦》之外，《西蜀异遇》当即宋人话本《李达道》（见《醉翁谈录》）的故事，《无鬼论》也有话本小说（同上），《四和香》又有北本灵怪小说（见《志雅堂杂抄》）。究竟哪一种文本在前，还很难说。类似这样通俗化的传奇体小说当时可能并不少见，但流传下来的不多，有的只存残篇佚文了。如《永乐大典》所收的《苏小卿》，《岁时广记》所引的《鸳鸯灯传》，就是介于传奇与话本之间的作品了。

宋代传奇的选本，除了鲁迅的《唐宋传奇集》，目前只有薛洪等所编的《宋人传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版），选目比较新鲜精当^①，注释也还详明，不过选录了不少简短的作品，是不是都可以称为

① 本文所举的篇目，不少已选入此书。

宋	·文学史百题·
诗	
漫	
谈	
(下)	吴小如

三 宋诗的分期问题

过去我在课堂上讲文学史，把宋诗分为六个阶段，即北宋、南宋各三个阶段。我没有用“分期”这一词语，因为说“分期”就有划时代的意思。我把北宋分成三个阶段，是以欧阳修和苏轼为标帜的，欧以前为一个阶段，苏以后是一个阶段。到南宋，仍以作家来划分阶段，即尤杨范陆为一个阶段，江湖派与四灵为一个阶段，宋末爱国诗人和遗民诗人作为一个阶段。这基本上依照史的发展顺序，没有什么新见。到1985年我在北大历史系讲《中国诗歌史》，把欧阳修以前称之为“宗唐”阶段，欧以后称之为“变唐”阶段。“变唐”阶段发展到苏轼是高峰，然后倾向于追求纯技巧，这就是江西诗派的形成，从而进入另一阶段。到了南宋尤、杨、范、陆创作期间，又是一个新阶段。尤诗虽佚，但他的诗成就不高是可以肯定的；其他三人各有特色，而以陆游成就为最高。再往后，宋诗就走下坡路了。江湖派比较“粗”，四灵诗又“细”得可怜。到宋末，诗人已不大注意艺术技巧，不过思想内容还有值得肯定之处。我原来的考虑就到这一步，除了想出一两个新名词（如“宗唐”、“变唐”）之外别无新意。

到1986年，从刊物上看到近年来有关宋诗研究的综合报导，其中谈到了宋诗分期的不同提法，有分四期的，有分五期或六期的，使人眼花缭乱。北大一位研究生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宋诗的分期及其标准》，把宋诗分成六期，即沿袭期、复古期、创

传奇，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书中还有一些错字，如作者姓名中李献民误作李宪民，廉布误作廉宣，读者需要注意核实。